

# 论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

段峰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 论文总结了翻译研究领域几种主要的认知模式,并在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背景下,分析了以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翻译认知模式,强调了该认知模式所揭示的翻译“第三空间”和“第三种文化现象”的认知和文化意义,并认为该认知模式是迄今为止翻译认知模式中的最合适和最具有说服力的模式,为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且具争论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的解释角度。

**关键词:** 认知翻译研究; 翻译认知模式; 心理空间; 概念整合

中图分类号: H5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6-0090-05

翻译的认知属性,如同翻译的语言属性和交际属性一样,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属性。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无论我们怎样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将其扩延为从译本选择到译本接受的过程,其核心部分还是译者的心理认知过程。翻译的目的是传达意义,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理解、阐释、选择、决定、表现文本意义的一个心理认知过程。即使是这个翻译的过程由于外力的作用,表现出某种被操控、改写的特征时,译者的认知能力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在翻译时的认知心理过程是翻译的一个重要本体问题;翻译的认知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由于此项研究主要借助相关学科如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等,翻译的认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跨学科翻译研究方向。长期以来,围绕着翻译过程这个几乎与翻译一样古老的问题<sup>[1]265</sup>,尽管提出了一些译者认知心理模式,但由于翻译过程不能明示和难以验证的“黑箱”性质,很难有一种模式能得到广泛的赞同。所以,翻译的认知研究同翻译的其他研究相比,一直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

较早谈及译者认知心理的翻译研究学者奈达提

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将源语的表层形式解码为源语的深层形式,经过一个被称为“传动机制”的过程,将源语的深层形式转换为译语的深层形式,再编码为译语的表层形式。但这个“传动机制”是如何工作的,奈达并没有讨论。相反,他认为,由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不知道语言数据在人脑中储存的方式,所以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晓当译者翻译时,发生在他大脑中的事情<sup>[2]145-146</sup>。奈达的观点在翻译界具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较长的时期里,翻译的认知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同时,自1980年代初开始,由于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例如主要研究范式从语言学范式转向文化范式,研究方式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研究的重心从翻译内部转向翻译外部等等,翻译认知研究的影响更显微,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逐渐成为一个边缘的研究方向。

然而,翻译的认知研究始终是翻译研究中不能绕过的一个话题。贝尔从翻译学科性的高度来提出翻译认知研究的重要性:“翻译研究中心理视角的增加,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笔译和口译,而且能够加深我们对人类交际的总体了解。这种视角

收稿日期: 2009-06-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SC08B07)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段峰(1962—),男,重庆市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研究、人类语言学。

的转变能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主要的、也许同所有的科学研究尤其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相并行的独立的研究领域。”<sup>[3] 190</sup>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并不意味着翻译研究只是一味引进其他学科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学科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他学科理论内化为翻译研究的自身特有的翻译理论,进而达到对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阐发。例如翻译的认知涉及到两种语言形态和意义结构,两种文化心理图式之间的转换、传达和调适。这种基于双语的认知心理研究与基于单语的认知心理研究显然有许多不同,而这些不同就是创立认知翻译理论的出发点。当这样的理论越来越多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基础就越来越牢固;翻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启示作用,对整个学术发展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浪潮过后,已有学者开始思考其负面影响,提出回归文本,回归翻译内部研究的观点。这种回归当然也包括回归译者作为一个认知主体,而非在社会文化关系网中的一个符号的研究。翻译的认知研究是否能在这种思考中重新引起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视?答案在于翻译的认知研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兼容消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新的内容,从新的向度来解决翻译认知研究这一重要但发展缓慢的研究方向。所以,对翻译的认知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展望,形成具有特点的认知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一 翻译认知模式回顾

翻译认知模式的提出始于口译领域。这同口译领域中注重译员翻译认知过程的分析 and 研究密切相关。口译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勒代雷(Lederer)和吉尔(Gile),都分别提出了口译过程中的译员认知心理模式。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将译员的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理解阶段、去言语阶段和重现阶段<sup>[4] 15-18-[5] 10-15</sup>。理解阶段主要是信息储存和记忆,涉及语义和语用的层面。译员运用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例如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对发言人的旨意进行阐释理解。他们认为翻译理解和传达的对象是意义,而意义根本上是超言语的,在基于语言的理解阶段和使用语言的重现阶段之间,存在一个非言语的认知阶段,一个概念化的阶段。译文重现阶段并不依附于源语形式,通过基于非言语的意义来实现。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认知模式将译者认

知心理过程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意义概念化的认知过程,在将意义研究突破传统的语言空间的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充满前景的认知研究视域。吉尔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在同声传译中的精力分配模式<sup>[6] 101-124</sup>。吉尔认为口译包括三个方面的任务,需要译员根据翻译时的情况,将精力或称认知的努力协调合理地分配到倾听和分析、话语形成和短时记忆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努力加上协调原则共同组成口译的过程。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在译员的心理活动中,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自动和非自动等二元体中,后者常常表现得更为复杂,更具个性化,吉尔对后者的强调突出了译员作为个体的认知主体在翻译过程的重要性。

以上翻译认知模式构成了释意派口译理论的核心部分,为口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者,如贝尔(Bell)、克拉力(Kiraly)、威尔斯(Wilss)和古特(Gutt)沿着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在功能和语用的框架中,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中的意义理解和表现。贝尔在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认知模式,并将功能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引入到他所提出的翻译认知模式中。贝尔认为,翻译过程可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认知心理过程。分析阶段从源语文本进入视觉识别系统开始,经历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到达语义再现阶段后,又开始语用综合、语义综合、句法综合阶段,然后经过译语书写系统后,形成译语文本<sup>[7] 55</sup>。在贝尔的翻译认知模式中,以语式、语场和语旨为内容的语用分析和语用综合分别为分析阶段的终点和综合阶段的起始点,表明其翻译认知模式的重心在于翻译的功能意义,而非形式和结构意义。

克拉力在其提出的翻译认知心理学模式中,将译者的心理工作空间分为长时记忆、相对未受控处理中心和相对受控处理中心。长时记忆包括文化、物质和社会图式、话语框架、与翻译相关的图式以及语言知识。外部信息输入后,非受控中心本能地将外部信息和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将产生的问题提供给受控中心,由受控中心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如受控中心不能提出解决的策略,则问题又返回到非受控中心,如此循环往复<sup>[8] 101</sup>。克拉力认知模式的意义在于提出了译者的本能和无意识心理空间在翻译认知活动中的作用,译者的心理

认知过程是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作用和补充的过程。

威尔斯所提出的翻译认知模式强调翻译是作决定的行为。关于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行为,列维(Levy)很早就提出过。他认为翻译作为交际活动,实际上也是译者的一个作决定的过程。翻译如同下棋一样,充满着许多可能性,译者就是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和决定<sup>[9] 148-159</sup>。威尔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过程。他区分了翻译认知活动中两种互补的知识,一种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在运用心理图式的基础上,陈述性知识解决的是知其然的问题,而程序性知识解决的是知其所以然的问题。程序性的知识经常表现为本能直觉的形式,在翻译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决定行为和根据外在环境自发调适的行为共同构成翻译的认知过程,包括确认问题、归类问题、提取相关信息、提出解决问题策略、选择方法、评价方法等阶段<sup>[10] 174-190</sup>。

斯博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言语交际的原则就是寻找最大程度的关联。格特将此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认为翻译是一个言语交际过程,这个过程符合关联理论的原则,也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即明示(原文)—推理(译者)—明示(译者)—推理(读者)这样一个翻译过程。在译者(读者)的推理过程中,寻找原文意义和译者理解最大程度的关联性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寻找关联性的推理过程中,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境包括外部语境和心理语境。译者的翻译过程就是在外部语境的基础上,调动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形成动态的心理语境。翻译中的对等是一种解释性相似,是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的结合<sup>[11] 179-201</sup>。

以上不同的翻译认知模式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而提出,例如侧重口译或笔译的模式;口译中还可分为同声传译和交互式口译。由于针对的对象不同,认知模式的强调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口译的认知模式重点强调译者去掉源语外壳的意义概念化过程,相对于将社会文化认知引入到翻译认知模式的其他模式而言则要简洁一些,这也是由于口译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些模式是否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还取决于这些认知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揭示了译者的实际认知心理。尽管如此,翻译的认知模式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不言而喻,它揭示了翻译过程的特征,这些特

征包括翻译过程中存在非言语、意义概念化阶段,如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认知模式中的去言语阶段,贝尔模式中的意义表达阶段,以及格特的解释性相似阶段;译者的内部心理认知过程同时受到外部功能和语用因素的影响,如克拉力模式中的社会文化图式;记忆和信息存储在译者认知中起着重要作用;翻译过程包含自动和非自动、受控和非受控、意识和非意识过程;翻译过程是一个非直线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等等。

翻译认知模式对翻译过程特征的揭示,为我们认识翻译、理解翻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尤其对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国外学者提出了将认知翻译研究(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研究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从学科层面上确立其重要的地位<sup>[12] 54</sup>,表明了翻译研究界对翻译认知研究的逐渐重视。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此项研究,并有一些成果发表<sup>[13-14]</sup>。就目前翻译认知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在认知科学大框架下的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虽然在一些模式中,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被纳入其中,但总体而言,翻译的认知研究主要研究语言之下的心智活动,这种心智活动与语言或语言代表的外部世界之间是否存在更多的联系,或者彼此之间能否打通,成为一个整体的认知过程,在以非语言的心智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翻译认知模式中,这一点似乎并未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缺乏理据的封闭性而妨碍了自身的发展。另外,受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翻译认知研究的概念表述和话语方式也表现出与翻译研究话语隔离的现象,客观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它的认同感。翻译的认知研究无疑为翻译研究展开了一片新的视野,但具体而言,翻译认知研究的基本研究路径应该是沿着以语言研究和认知心理研究相重叠的道路发展,如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翻译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无疑也是一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当前语言学界风头正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对翻译认知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其影响力,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甚至会引起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sup>[15]</sup>。

## 二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与翻译认知模式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1980年代,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

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学科领域”<sup>[16] 161</sup>。基于“现实—认知—语言”这条主线,认知语言学将范畴化、原型理论、隐喻概念、意象图式、语法化以及象似性等概念作为研究内容,这些内容与翻译的认知研究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对这些概念内容的研究对翻译活动同样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和启示意义。王寅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归为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认为这些内容构成了认知语言学翻译观<sup>[16] 584-591</sup>。以这种翻译观为指导的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覆盖了翻译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话题,构成认知翻译研究这一新的翻译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内容包括认知格式塔与翻译再现、认知隐喻与翻译、翻译中的认知对等、翻译的动态认知过程、认知与文化翻译、认知模式与语篇翻译、认知的象似性与翻译、认知与译者主体性研究、认知与语用翻译、认知语境与翻译、认知科学与机器翻译、认知取向的翻译教学等<sup>[15]</sup>。

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所涉猎的所有翻译研究话题中,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研究最具意义。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翻译认知模式中,基于认知语言学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所构建的翻译认知模式是目前最完善、最有说服力的翻译认知模式。

认知语言学家福科尼尔(Fauconnier)在1985年提出心理空间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构筑自己的心理空间<sup>[17] 1</sup>。心理空间是思维和说话时临时构建的部分信息集合,属于认知范畴,是帮助人们进行思维、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认知结构。在心理空间的基础上,福科尼尔提出概念整合理论,主要观点为建立相互映射的心理空间网络,由四个心理空间组成,其中两个心理空间被称为输入空间,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跨空间的映射空间,即类属空间,第四个空间被称为整合空间,是从输入空间进行有选择性的映射而来,以各种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层创结构,并把这一结构映射给网络中的其它空间。层创结构由三种相关联的方式产生:一是组合,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投射组合起来,形成每个输入空间以前所不存在的关系;二是完善,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组合结构从输入空间映射到合成空间;三是扩展,合成空间中的结构可以扩展<sup>[18] 149-151</sup>。

基于福科尼尔的概念整合理论,翻译的认知模式可以被描述成输入空间1,由源语文本结构以及相关文化心理图式构成;输入空间2,由译语表现形式以及相关文化心理图式构成;源语和译语共享的心理图式相当于类属空间;在类属空间的制约下,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性地映射组成整合空间,并通过组合、完善、扩展等方式构成层创结构,产生新的表达方式即译文文本。

同以往的翻译认知模式相比较,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认知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更能揭示出翻译的本质,加深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一是通过两个认知心理空间说明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文本结构差异所引发的文化图式的不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除语言之间的转换外,还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的调适问题,基于不同文化图式的文化认知会直接影响翻译过程的进行。二是通过类属空间说明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尽管不同文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文化图式不同,但基于世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不同的文化图式中存在许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三是在整合空间中所形成的层创结构说明了翻译创造性的存在,这也是该认知模式最具亮点的部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认知模式提出了区别源语及源语文化图式空间和译语及译语文化图式空间的第三空间概念,即译者的创造性空间;从理论上解释了翻译中多译本、重译本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颇具启示意义。此外,在整合空间中,“由层创结构独立生成的文本,虽为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表征整合,但并非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第三种文化现象”<sup>[19] 2</sup>。

认知翻译研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认知模式研究,二是翻译能力研究<sup>[12] 189</sup>。前者致力于翻译过程描写的理论构建,后者则着重研究译者语言认知、语用认知、文化认知等相关认知能力的结合和实际运用。前者的研究成果是后者的研究基础。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克服了传统翻译认知研究中体验与认知相脱节的弊病,打通了体验与认知的隔阂,将翻译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翻译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发展并超越了以往的翻译认知模式,给翻译的认知研究带来新的前景。从而为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且具争

论性的问题,如译者主体性问题,翻译创造性问题,新的、有力的解释角度。  
译者文化身份和译文文化定位等问题,提供了一个

### 参考文献:

- [ 1 ] Jaaskelainen, Riitta. Think-aloud protocols[ C ] //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FLEP, 2004.
- [ 2 ] Nida, Eugen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 3 ] Bell, Roger. Psycholinguistic/cognitive approaches[ C ] //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FLEP, 2004.
- [ 4 ] 勒代雷. 释意派口笔译理论[ M ]. 刘和平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1.
- [ 5 ] 塞莱斯科维奇. 口译训练指南(引进版)[ M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7.
- [ 6 ] Gile, Daniel.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 M ].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 7 ]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 Beijing: FLTRP, 2001.
- [ 8 ] Kiraly, Daniel.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 M ].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9 ] Venturi, Lawrence.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 C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 10 ] Wilss, Wo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 M ].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 11 ] 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 Shanghai: SFLEP, 2004.
- [ 12 ] Albir, Amparo Hurtado & Fabio Alves. Translation as a cognitive activity[ C ] // Jeremy Munday,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 13 ]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 14 ] 刘绍龙. 翻译心理学[ 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 15 ] 刘军平. 重构翻译研究的认知图景——开创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J ].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6)4.
- [ 16 ]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 17 ] Fauconnier, Gile. *Mental Spaces*[ M ]. Cambridge: MIT Pres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994.
- [ 18 ] Fauconnier, Gile.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19 ] 王斌. 翻译与概念整合[ M ].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On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ory Studies

DUAN Fe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summarizes some main cognitive models ever exist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zes the new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mental space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ies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evaluates highly the cognitiv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Space” and “The Third Culture” signified by the new model, and argues that it is by far the most persuasive cognitive model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offers a completely new and reliable approach to some unsettled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mental space; conceptual blending

[ 责任编辑:张思武]